陈崧编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陈 崧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小玲
封面设计　王彦苹
版式设计　李玲玲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Wu-Si Qianhou Dongxi Wenhua Wenti Lunzhan Wenxuan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5印张　2插页　522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统一书号：11190·143　　定价：3.25元

编辑说明

一、本资料汇集的文章选自1915年至1927年我国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多数系全文照录，少数文章因篇幅过长或部分内容与文化问题相距甚远，做了一些删节。

二、本资料所选文章分做三大部分，基本上按正式出版时间为序排列，为了照顾讨论主题的连贯性，少量文章在编排上打破了时间的顺序。

三、本资料所选每篇文章之前，编者均加了“提要”，供使用者参考。

四、原文无标点的，编者加了标点。原文有标点的，大体保留发表时所采用的断句、标点，个别错误做了校正。

五、本书采用简化字。易引起误会或产生歧义的字则保留繁体或原用异体字。凡系发表时用字习惯，如“得”、“的”、“地”不加区分，“他”、“她”、“它”不加区分，“那”、“哪”不加区分，所有格“的”用“底”等，一律未加改动。

六、当时报刊排印错讹甚多，明显错字，字后标明正字，加（ ）号；明显漏字，字后补字，加〔 〕号；明显衍字，字后注明（×字衍）。为保持原貌，部分错讹之处未予改动。

七、原文有注释者，均依原格式，排于文章末尾。编者新加注释，一律做脚注。

八、作者简介，均列于所选该作者第一篇文章第一页下方。为人们所熟悉的作者，介绍从简。作者所用笔名如不为

常人尽知者，一律加了注释。少数作者生平尚未查知或生卒年不详，暂付阙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一)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文明问题，文化问题，始终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别是在历史的重大变革时期，文化问题就更加成为十分敏感的、争辩激烈的课题。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往往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问题一直能动地影响着社会政治，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以及怎样建立某种文化，实质上提出的也就是社会、民族、国家变革的性质与方向问题。所以，文化问题上的重大论争，无不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鸦片战争以后，文化问题上的论战迭起，学校科举之争，中学西学之争，旧学新学之争，以及文言白话之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争，等等，环环相扣，从未间断。这些论战不仅反映着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动向，而且反映着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变化的趋势。到了五四前后，文化上的论战遂形成高潮。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空前的。从一九一五年《新

青年》①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开始，争辩延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这场论战，既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反映。这场论战，对以后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文化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论战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比较集中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中又具体涉及如何解决文化的继承与革新，如何对文化进行阶级分析，如何看待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如何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如何认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树立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提倡什么样的社会风尚和怎样建立这种社会风尚，等等方面。总之，这场文化问题的论战，实际上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虽然历来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对立着的两大文明体系来进行分析、比较、评判、论辩，却是近代的事。例如，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传入中国，虽也与中国固有文化存在过斗争与融合，形成互相排斥与互相吸取的过程，有时矛盾也激化到很尖锐的程度，但是还没有影响到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及商人东来，形成一阵“西学东渐”的风潮。由于那个时期，输入的多为新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至于政治、道德、哲学及各种社会思想方面则所涉有限，对于西方各国究竟是怎样的国家，中国

① 该杂志于1915年创刊时取名《青年杂志》，后于1916年第2卷起改为《新青年》。

人更是了解甚少。所以，那时候文化学术上虽然也曾产生过一些纷争，但是并没有构成两种性质的文化的对立，没有使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受到大震动，更没有因此而掀起社会思潮大变革的风暴。总之，当时并没有形成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以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局面。

鸦片战争以后，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之后，中国所面临的西洋文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奇的"外来文明"，而是一种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存亡命运的力量了。这种西洋文明与我们自己固有的文明，由于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截然不同的阶段，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并没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更没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战胜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五四"前夜，伴随着政治上复辟活动的卷土重来，文化上尊孔读经的谬论也纷至沓来。"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成了配合"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反动政治纲领的反动文化纲领。文化上的斗争远较辛亥革命前激烈，这就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的，是保证政治革命取得成功的不可欠缺的重要一环。他们力图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①"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

①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

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这种认识，固然并没有科学地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当时先进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在社会变革、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开始认识到开展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清除人们思想中封建主义毒素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这场论战，从一九一五年起延续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二七年，因思想战线上争辩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等问题上去，方才告一段落。这次论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这场论战的影响至为重大，仅就文化思想的变革而言，也是很深刻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的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这次长达十余年的大论战，由于论战内容的发展和争论重点的变化，又可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当然，其中有交叉现象）：从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创刊算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为止，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期。当时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大体集中于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方面。论

①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战双方大多还是从表面现象上来罗列东西文明的异同，往往不能抓住本质问题。同时双方的文章中几乎无例外地都包含着许多含糊不清，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但是，从这个时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两种对立的文化观已经摆开了阵势。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进入了论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论战是以讨论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开始而逐步深入的。从比较"东"与"西"，发展到着重探讨"旧"与"新"，亦即着重探讨新文化和旧文化有无实质上的差别，以及应该如何处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因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而引起的激烈争论，形成了文化论战的高潮。虽然论战的内容似乎又回到了比较"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长短优劣这个老题目上去，但是这时辩论的实质已远非昔比。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打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的重新探讨。在这个时期，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先进战士们举起的已经是大书"社会主义文化"字样的战旗。

（二）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完全不受外来影响，是完全"独创"的。①这不符合实际。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确实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有重大特色的文化形态。虽然它也不断吸取外来的营养，但它自成系统；虽然它也随着时

①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

代而变革，但它在近两千年中保持着明显的连贯性；虽然它也遇到种种挑战，但它渡过了一个个关隘，长时期发挥着效能。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但也形成了具有极大保守品格的惰性力量。

中国文化传统如此悠久，改变它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长时间里，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也没有使人们感到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用另一种类型的文化来取而代之的需要。这种需要，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却一下子变得非常迫切，而被提到了人们面前。一向自恃的"天朝大国"，突然在列强的欺凌中，显示出已经变成落伍的弱者，这就使一些头脑多少清醒的人不能不看到仅仅依靠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无法改变这种局面。改变传统文化的需要，提上了日程。这种需求，由于世界上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对照中愈形强烈。

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输入中国之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两种文化形态，而且是如此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人们也逐渐明白，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显然是造成国势强弱、社会贫富的直接原因之一。于是，人们不能不被迫把两种文化拿来做比较了。

比较差异，是为了评论优劣。差异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对于两种文化差异的性质的分析和评论，却形成了尖锐的分歧。一九一五年，终于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等为另一方，拉开了东西文化论战之幕。

当时陈独秀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还所知甚少，尤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他是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投入反对封建文化的战斗的。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新青年》，创刊号上就明确提出要中国"改弦更张"，力主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地攻击中国的旧思想，尤其对孔教进行了讨伐，一时在中国文化论坛上造成巨响。《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直言不讳地主张"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声明他们的活动是以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为目的。陈独秀认为，近世文明的特征有三方面："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① 而具备这种特征的典型国家是法国。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所羡慕并引以为战斗纲领的乃是《人权宣言》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们强调，为了使中国脱离蒙昧时代，应该急起直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反对中国固有的旧文化。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明确提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他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加以比较，做出如下概括。东方民族的特点是：（一）"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爱和平"，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二）"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遵循着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三）"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的特点则是：（一）"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二）"以个人为本位"，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民族。"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

①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陈独秀根据这种粗略的比较，对中国固有的封建宗法制度展开猛烈的轰击。他认为实行宗法制度带来了四大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象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陈独秀当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幻想，从资产阶级法制到个人主义，他一律加以美化和推崇，甚至把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关系，说成是“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可是，应当承认，他正是以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特点，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的固有文明的虚伪与腐朽：“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依赖成性，生产日微”，结果是弱群弱国，使东方民族无法不陷于被征服被奴役的地位。

《新青年》对固有文明的勇敢挑战，在中国文化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清末的守旧派主要的论调，还是硬说中国列祖列宗的整个一套制度和教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不可动摇的立国的根本。到了五四前夕，在文化问题论战的战场上，固执地重唱旧调的遗老遗少也还有，如林纾、辜鸿铭以及孔教会的一帮人，可惜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已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有着较大影响的守旧人士，一般则是绕着圈子，只承认两种文化有民族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心理的差异，否认两种文化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社会思潮的变化，迫使他们不能再用排外主义的办法简单拒绝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文明，转而采取一种似乎学通东西、而且又公允持平的姿态，发表一些不可把两种文化比高下，只应“取长补短”之类的议论。实际上他们是借此否认固有文明有实行根本改造的必要，并把传统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糟

粕，如“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类都作为中国的国粹保持下来。以这种姿态树起卫道旗帜，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代表，就是《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东方杂志》于一九〇四年创刊。一九一三年，杜亚泉在《论社会主义运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一文中，也曾含糊表示：中国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可以吸取，国体政体也可参考西方进行改革，但是道德、文学、宗教，以及社会风习、家族制度，都不宜改变。《新青年》创刊后，他一变过去模棱两可的态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论敌。他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便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自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假之所在。”他认为，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① 他认为东西方之根本不同，是由于社会成立之历史、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观念也就不同。他把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分别归类为“动的社会”与“静的社会”，并断言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但是“不可不以静为基础”，“故吾愿吾人对于此静的社会与静的文明，勿复厌弃而一加咀嚼也。”② 提出“取长补短”，岂不是无可非议的公正态度吗？其

①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②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合》，《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

实不然，“静为基础”这句话便概括出他的极其鲜明的倾向。实际上，他所说的西方物质文明之“短”，就“短”在讲科学，由于科学发达便引起竞争与冲突；东方精神文明之“长”，就“长”在只讲道德，不讲科学，不饥不寒就满足了，所以恬淡和平。在这场刚刚兴起的东西文明的争论中，伧父一反过去提倡科学技术的作法，在“取长补短”的名义下，直接了当地宣称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不要把科学学说视为“信条”，而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种统一的标准，于是造成“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① 他主张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用儒家思想加以“统整”，以儒家思想为“国是”、“国基”，使中国固有文明发扬光大。《东方杂志》是当时舆论界很有影响的大型杂志，伧父又不象那些遗老遗少对西方文化的无知，颇有既懂得自然科学又深知西方文明弊病所在的模样，因此他的论点在知识界影响颇大。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十分重视伧父的议论，并认真地进行了反驳。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由此全面展开。

一九一八年六月，李大钊发表了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从字面上看，他和伧父一样，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性，概括为“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并且由此推演出几十项两种文明的具体差异。这种对于东西文明差异的概括固然包含着许多模糊观念，表现出他当时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不过，从他分析东西文明差别所得出的总结论来看，却与伧父正好相反。李大钊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世界

---

① 《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

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现在则应对世界做出第二次贡献。但是，要做出这种贡献，就必须"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就必须有勇气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他不象伧父那样颂扬"静的文明"，相反地认为中国人应当正视现实，看到这种"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的"动的文明"，"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但与我们的"静的文明"相比较，则"实居优越之域"。因而他针对伧父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力主"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提倡青年人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对"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实行"根本扫荡"。①

陈独秀更是对伧父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质问，进行了犀利的批驳。他理直气壮地鼓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论证了主张民主共和与主张功利主义的一致性，并坚决驳斥伧父把"儒术"当作中国不可动摇的"国基"，把"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类"固有文明"当作永不可变的"信条"，拒绝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言论。他敏锐地察觉到维护封建文化的论调，与封建势力图谋复辟帝制、反对共和的政治活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这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辩论中，陈独秀打起了"德""赛"二先生的大旗，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支柱与封建文化相抗衡。一九一八年七月，陈独秀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② 此时，陈独秀表现了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革命精神，但同时也开了"全盘西化"

①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
②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1号，1918年7月。

说的先河。

可以看出，五四前夕关于东西文明的论战，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论战双方虽然还只是通过列举某些表面的现象，甚至是捕风捉影地拟出一些牵强的“特征”，用以说明东西文明的差异，不过，比较两种文明的基本态度却已形成明确的思想分野。表面上看来，大家都是在说明两种文化很不相同，然而对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优劣所下的判别，却是针锋相对的，而且论战风浪一起，很快就演化成了无法遏止的滔天波涛。

（三）

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固有文明”进行了猛烈冲击。新文化激流的来势之猛，时代精神的变化之快，是十分惊人的。新文化、新思潮，既然象台风那样，排山倒海而来，席卷中国大地，全然拒绝新文化已为形势所不许。于是一些守旧的人士也只好从如何处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关系这样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了。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文化论坛上便发生了关于“新旧调和”问题的论战。

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调和的主张，正象前边所说，在五四以前，伧父等人已经提出过，李大钊也有过一些关于东西方文化可以调和的说法。陈独秀曾讲过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断断不可调和的话。不过那时候人们所说的“调和”，含义还不确定，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争论的焦点。在五四以后的新条件下，文化战线上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新旧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则成了讨论的主题。

一九一九年秋天起，章士钊先后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发表讲话，鼓吹新旧调和之说。陈嘉异、伧父等人也纷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